

日本政府核心成员近日频频就台湾问题发声。日本国家安保局长秋叶刚男周一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两人强调维系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岸信夫近日还以防卫大臣的身份接受英国《金融时报》的采访，中心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本身极为不寻常。以往，我们似乎有一种认识，觉得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只是美国的战略附庸狐假虎威，至多是助纣为虐。然而，自今年3月的日美2+2东京会谈以来，日本在台湾问题上似乎比美国更为积极主动，暴露了日本既有与美国狼狽为奸的一面，更有主动挑事、在台湾问题上打头阵的一面。

日本对台湾问题看似咄咄逼人，实则反映出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极大战略焦虑。第一，对中国发展势不可挡的焦虑。在全球疫情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仍在继续扩散的时候，中国积极作为，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今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12.7%，两年平均增长5.3%。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劲发展，大大加速了中国大陆统一的进程。

第二，对日本继续走向衰落的焦虑。东京奥运会原本是作为重振日本经济、提振国民信心的重大契机，但“人算不如天算”，2020年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迄今依然没有得到全面控制，东京奥运会在推迟一年后“无观众”举行，使得上述目标难以实现。

第三，对中美关系可能趋缓的焦虑。这次中美天津会谈看似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但正如新任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所说，中美关系的大门已经打开，就不会关上。天津会晤的意义就在于这是拜登上任后在中国举行的第一次两国高官会谈。尽管中美双方的分歧依然巨大而尖锐，但会谈后发表的报道看，中美双方都有稳住中美关系的高度共识。对中美关系接下来的走向，笔者持乐观态度。从全球事务和国家根本利益上看，中国需要美国，美国更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今天也更需要中国。对于一心想遏制中国发展、并乐见中美对立的日本来说，对中美关系可能走向缓和，东京有难以名状的焦虑。

第四，对我愈加上升国际影响力的焦虑。针对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围绕新冠病毒蔓延抹黑打压甚至诬陷中国的疯狂行为，中国近来围绕病毒溯源、抗击疫情、世界经济发展、外交军事等全方位与美西方的博弈，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舞台和中外双边场合，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响应和支持，显示我们在世界上的广泛影响力。

日本已不仅是被动跟随美国的小弟

吕小庆

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的一连串行动表明，在台湾问题上，不能把它仅仅看作是跟在美国后面的小弟。从历史渊源和现实利益上，日本从未放弃在台湾问题上的妄想和企图。在中美关系出现趋缓迹象的关键时刻，日本按捺不住战略焦虑下的冲动，想在台湾问题上挑头，目的有三：一是想把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并在这方面不停搞一些小动作。就像这届奥运会开幕式上，刻意特殊安排了台湾的出场顺序，使之与中国大陆进行物理上的切割。二是想把台湾问题更加国际化。在多位日本高官的措辞中，话里话外都带着所谓“国际社会”。岸信夫向英国媒体呼吁，国际社会应更加关注“台湾的生存”。东京心里清楚，单独对上中国，它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妄想联合所谓国际社会，在台湾问题上形成对中国新一轮的围堵和打压。三是想使台湾这个高度敏感的问题更加常态化。

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日本接下来很可能成为在台湾问题上冒头、也最主动的一股势力。美国近来在台湾问题上只做不说，日本则是又说又做。下一步，日本很可能会设法督促美国不放松

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踩线越轨的上蹿下跳，我们必须予以严正警告：在台湾问题上的冒险无异于挑起战争，玩火者必自焚。同时，我们应该主动作为，在国际舞台上使台湾问题的界限更加清晰，以此打掉日本的企图，并在国际社会孤立和打击试图分裂台湾的种种势力。这样的主动作为，针对日本，也是让美国和国际社会看到台湾问题之于我们是绝对刚性的，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此外，为牵制日本的妄动，琉球问题可以再议。近代以来，日本正是借琉球问题侵略台湾，并在非法吞并琉球后把黑手伸向台湾，其后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当前形势下，再议琉球问题更显得十分必要。

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方有必要提醒日方不忘初心，中日复交三原则的前提是正确处理“日台关系”，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也是台湾问题。日本必须严格恪守国际法和国家关系准则，坚守在中日共同声明中所做的国家承诺，充分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完全执行《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这方面绝无任何灰色空间。▲（作者是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前中国驻日大使馆参赞）



澳大利亚与印度走近意味着什么

钱峰

近来，印度与澳大利亚继续靠拢走近。先是印度海军发表声明称已派特遣舰队向东，与澳大利亚等国举行联演，并计划于月底在关岛附近举行第二次汇集印美日澳四国海军的“2021马拉巴尔”军演，后有澳前总理阿博特访印归来，撰文大谈印度可在全球供应链上“完美取代中国”，还声称“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问题的答案都是印度”。作为“四国机制”的两个重要成员，新德里和堪培拉姿态亲善，互动频频，似乎正在加快补回昔日欠账，推动“四国机制”更趋实质化，这也给那些国际上的反华势力留下不小的遐想空间。

现在能将印澳这两个地理相距遥远的国家绑在一起的，自然不是共同师承英伦的“议会民主体制”，而是自特朗普时代起由美国高调主推、一手主导，印日澳三国积极回应的“四国机制”。但较之美日澳盟国之间和美印、日印几组关系，印澳关系不仅是相对疏远和薄弱的“短板”，而且两国还曾因1998年印度核试验龃龉不断甚至交恶多年。

形势的变化和共同的利益驱使印澳开始抛弃前嫌，不断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领域走近。尤其去年以来，从两国签署《军事后勤互助支持协议》到印首次邀请澳参加“马拉巴尔”军演，从两国与日本启动三方部长级“供应链弹性倡议”会议，到“四国外长”直至“四国峰会”，双方关系升温势头显著，也标志着彼此在对方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明显提升。

对于印度而言，提升印澳合作关系，一方面可以增加手中的外交筹码，更好推进既定的“东向行动”战略。另一方面，也可在中印关系低迷且印方无法“单独抗击”中国之际，拉澳制华，让中国感受到“清晰有力的反制信号”，还可通过迎合美国“印太战略”的部分需求，展现新德里“疏中靠美”的姿态，赢得美国给予的更多实惠。对于澳大利亚来说，疫情以来中澳关系严重恶化并持续趋冷。无论是继续充当美国的

“反华急先锋”，还是未来扩大对印太安全事务的影响，澳大利亚都急需需要一个更具实质内容的“四国机制”。因此，选择像印这样“志同道合”的国家可以互为援手，共同向中国施压。

在笔者看来，两国的算盘虽然都打得很精，但对中国来说，印澳走近在战略上毫不足惧，最多是在外交上给我们添些堵。要么是如澳大利亚这般，身处世界变局中却没考虑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和怎么干，加上其政治、外交、安全机构、关联智库和媒体早已被美右翼势力深度渗透，它的对华政策很难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做出自主理性的决策。盲目坚信自己既可以从中国继续捞取经济利益，又可以无所顾忌地挑战中国核心利益，贸然在对外战略和政策上作出了“一边倒”选择，甘愿做美国“反华急先锋”。要么如印度这样，外交经验和战略智慧远比堪培拉老到，深知中印关系突破底线，走向破裂甚至公然对抗与自身利益不符，更多的是在对华发难的问题上“多做少说”，以含沙射影为主，公然挑衅则寥寥。因此，即便印澳合作“再上层楼”，届时国际舞台上也就再多几声遥相呼应的反华杂音罢了。

如果两国未来联手在印度洋地区给中国找点事，虽说是实力决定一切，但也不得不防。在美国主推的构想中，通过深入整合美日澳、美日印这两个三边机制，有助于建立一个以联合海上巡航、完善各方武器平台和军事装备的互操作性、完善印太海域感知系统建设甚至强化地区导弹防御等为关键合作内容的“四国机制”。澳大利亚与印度地理上一南一北，恰好位于印度洋的两端，扼守“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要道。随着中国在印度洋利益增多而防卫重心又侧重太平洋的当下，印澳加强海上军事合作，理论上可以充当“四国机制”在印度洋地区看住中国的“带刀侧卫”，其潜在影响则不容忽视。▲（作者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拜登出任总统后，全世界都期盼新一届美国政府实行完全不同于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令人失望的是，拜登保留了前任对华政策的大部分内容，虽然有一定可预见性，但也更冷酷。在美国国内，抨击中国几乎成了“政治正确”，也是两党共识。而在中国也有一种共识，即美国试图通过挑起台湾、香港、新疆等中国内政问题来达到蓄意破坏中国崛起的战略目的。

较之以往，我们听到的理性声音显然在减少。可能是很多复杂原因使然，或是个人观点的变化、或是对双边关系的失望，也有可能受到政治正确的限制，等等。笔者在丹麦就遇到这种情况，有些资深中国研究教授和学者对丹麦政府在中美之间的选边

智慧，它通过对亚洲、中东、欧盟和美国的多元国际关系专家深度访谈和讨论总结而来，笔者也是贡献者之一。

第二，这份报告的题目“电报”带有明喻和暗喻双重性。明喻是指，它与冷战时期乔治·凯南撰写的报告“长电报”相呼应。《电报》明确指出，中美博弈并非冷战，中国也不是苏联。暗喻则是，这份报告题目在暗示美国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凯南对中国和国际形势做出正确分析。

第三，《电报》提出拜登政府可在3个领域与中国合作：一是，美国和中国成立全球疫情处理与防疫战略指挥部，并可邀请日本、欧盟以及其他任何想加入的国家参加。这个指挥部也可转变为美军和解放军的接触渠道，从

美国对华理性声音值得关注

李彤

站十分失望，从而对推动双边关系和建言献策变得消极。

不过，即使大氛围如此，我们还是能不时听到来自美国方面的正面理性声音。比如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指出，美国希望中国按照它的思路来处理问题是极端幼稚的，美国没有能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也不可能按美国的意愿改变中国。《外交政策》今年两次发表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的文章：“中国也希望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世界可能想要中国制定的规则”。沃尔特同样认为，美国逼迫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不可取的。中国认可的国际秩序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的联合国主导的秩序，即尊重主权、尊重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刚刚出版中国政策建议报告《电报：拜登总统的中国议程》（下称《电报》）。作者萨瓦·克什梅里是一位国际关系专家、作家和评论员，他2019年出版的《中国大战略：编织一条通往全球首要地位的新丝绸之路》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的百年纪念书。笔者基于三个原因认为《电报》是相对理性的对华声音。第一，这份报告是集体的

而进一步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局势。二是，美国和中国在持续竞争中共同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两国都是碳排放大国，中国气候问题特使解振华和美国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已进行多轮视频会谈，达成中美应该加强合作以减少碳排放的共识。这非常令人鼓舞。三是，拜登目前提出了一项庞大的基础设施重建计划，美国应该找到一种方法，将它的基础设施需求与中国在建设高质量基础设施方面积累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而且，邀请中国加入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意味着它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间接认可。

《电报：拜登总统的中国议程》的出炉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这确实是积极正面的理性声音。但另一方面，随着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学界现在只有形形色色的战术家而缺少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目前“反中”被煽动成为美国主流政治共识，并被扭曲成为所谓民意基础，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之类的对华理性声音和政策建议是否能成为最后燎原的星星之火，有待观察。▲（作者是丹麦王国奥尔堡大学政治与社会系、国际关系学教授）